

“黑色星期二”：美国对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应对

□ 李 明

1929年10月29日，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那个黑色星期二，美国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股市崩盘。一场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由此开始，并贯穿整个30年代，极大地影响了这个曾经“咆哮着”飞速发展的国家。1929年大萧条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经济危机事件，它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的持续衰退，并引发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大萧条应对中，美国形成了全面的经济干预制度及其政策工具，其经验教训值得反思。

大萧条前后的美国经济状况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美国经历西进运动、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基本奉行自由放任政策，早期的经济增长迅速。同时，垄断资本高速扩张，新兴基础产业甚至日用品行业都被形形色色的“大王”所占据，有的行业份额竟然达到90%。1929年前，美国经济增长预期看好，社会各界投资热情高涨。1924年下半年，世界各地资金涌入纽约股市，股票指数攀升，1929年9月3日达381.17点，表面上一片繁荣。

1929年3月，时任总统胡佛宣称：“我对国家的未来毫不忧虑，它光辉灿烂，充满希望。”同时，经济学家欧文·费雪还推导出股市将持续上涨，在1929年大萧条时期的华尔街投机狂潮里，欧文·费雪是高高翘起的一朵浪花。他利用高倍杠杆，大举买入斯佩里·兰德公司的股票以及一些中小公司股票，高峰时其持有的股票市值达800万—1000万美元。值得说明的是，1929年的1美元大约相当于2023年的17.7美元，则其市值超过今天的1亿美元。1929年10月底，美国股市崩盘。欧文·费雪的股票灰飞烟灭。

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股灾的突然爆发，为这种幻象画上了句号。纽约证交所当天9点开盘基本正常，到11时大量卖单瞬间抛出，仅1小时股指猛跌20%，紧接着断崖式下跌。13时，摩根、大通、花旗等银行紧急出巨资托市，纽交所道琼斯股指开始攀升。28日，人们又在疯狂抛售股票，股指又迅

速下跌。29日，被称作“黑色星期二”，股指狂跌，全天流失资金140亿美元。一周累计流失300亿美元，为美国当年GDP的29%。

股灾后，紧随其后爆发大萧条，给世界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美国人均收入、税收、企业盈利、物价、进出口等指标全面下挫，失业率飙升到25%，有的国家高达33%。美国当时流行“梅隆拉动汽笛，胡佛敲响车钟。华尔街发信号，美国往地狱冲”的歌谣，生动表现了当时的场景。1930年，利率跌入谷底，消费者、企业在紧缩预期下都减少消费和投资，紧缩循环开始。1931年，农业区情况持续恶化，消费品市场一落千丈，失业问题更加严重。1932年，大萧条使欧洲大陆和拉美各国政治右翼化。1933年初，全球大多数经济体经济开始恢复，但直到30年代末，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大萧条事件的应对政策评价

关于大萧条发生的原因，不同的理论给出了不同解释。凯恩斯主义认为，消费者、投资者信心下降，导致消费和投资萎缩，加上净出口下降，是大萧条的原因。货币主义认为，大萧条是货币现象，是由于金融体系缺陷，导致了货币紧缩造成。也有人认为，大萧条是金本位后果，货币市场缺乏弹性造成等。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则从银行视角对大萧条危机进行了系统阐述，值得关注。

大萧条初期，美国总统胡佛采取了保守自由主义的政策。先是大幅度提高进口关税，但刺激了各国启用报复性关税，美国出口迅速降低。随之，改为由主要银行组成国家信贷公司，让其自愿为破产小银行贷款，但收效甚微。紧接着，出台贷款办法，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房贷，但又受制于贷款人支付能力。总之，大萧条期间，美国政府虽然实行大规模减税，但导致政府收入剧减，不得为之又增税，还重建金融公司，提供政府担保贷款，仍然效果不佳。

纽约股市崩溃发生之后，美国参议院即对股市进行了调查，发现有严重的操纵、欺诈和内幕交易行为，1932年银

行倒闭风潮，又暴露出金融界的诸多问题。在痛定思痛、总结教训的基础上，从1933年开始，罗斯福政府开始救济、复兴和改革新政并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一是完善金融制度体系，即银行业整顿、恢复信用，建立储蓄保险公司保障储蓄安全，放弃金本位，美元贬值促出口，实行投行、商业银行分业经营，强化美联储的央行职能，加强证券业监管等，并通过《紧急银行救济法》等予以制度化。二是调整农业政策，即成立农业电气化机构、休耕轮作、农业补贴、调整结构、稳定价格、保护土壤等，并通过《农业调整法》予以制度化。三是制定工业复兴政策，即管制公用事业公司，加强通信和运输业管制，建立国家复兴管理局等，并通过《国家工业复兴法》予以制度化。四是调整劳工关系制度，即保障组建工会、集体谈判、罢工等权利，规定最低工资、禁用童工等内容，并通过《国家劳工关系法》等法案制度化。五是社会救济政策，即建立紧急救济署，发放紧急救济金，推行以工代赈等，并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制度化。六是制定公共工程建设政策，建立公共工程局、工程进展署等机构，兴办医院、学校、道路、市政、水利、军用设施及田纳西河流域改造等公共工程，并交给企业承担。此外，为应对危机，美国联邦政府出台大量法律法规，建立一大批监管机构，强化了干预，缓解了危机，有的至今仍发挥作用。经历了大混乱与大崩溃之后，美国股市终于开始迈向理性、公正和透明。

大萧条危机应对的经验教训

从1929年那场经济危机的产生以及后续的影响程度，可以看出，在世界经济逐渐全球化、一体化的过程中，各国经济发展的依存度、联系程度也是愈发紧密。回首人类历史上应对经济危机

的经验教训，对于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我们，仍具价值和意义。

强化政府干预，增强信心和预期。大萧条初期，胡佛总统反对干预，主张市场的自我修复，但收效甚微，黯然退场。罗斯福新政则强化干预，恢复信心，尤其以立法增强可预期性。联邦政府支出在危机前占GDP比例不到3%，1939年就超过10%。后来逐年强化，最高时期的2010年达26%，2023年达23.7%。因此，在应对通缩型经济危机时，要强化投资、消费信心，并严格法治，管理好预期。

实行综合举措，并保持一致性。政府实施了多元政策应对大萧条。一方面，针对银行倒闭风潮，改革金融体系，加强证券监管，确保流动性适度。同时，兴建公共工程、增加就业，刺激复苏。另一方面，实行贫困救济、最低工资保障、缩小贫富差距等措施，促进消费增长。因此，面对危机要综合运用财政、货币、社会、环境等政策工具，并评估政策一致性，防止形成目标冲突，降低政策效果很关键。

增强活力，控制杠杆率。大萧条前，美国行业垄断严重，垄断者设置壁垒，攫取超额利润，打击竞争者，甚至蔓延到各领域，降低了经济活力，恶化了发展环境。同时，随着一战的结束，战争需求消失，短暂繁荣后，产能过剩。此外，加上资金低利率，证券高收益，又刺激股市投资，推高宏观杠杆率。因此，增强经济活力，必须治理产能过剩，打击不正当竞争，避免过度投机，并防止资本蔓延。

安全理念重塑，并深入各领域。大萧条及后续二战爆发，重塑了政府的国家安全职能，不再局限于原有的抵御入侵和公共安全，还纳入了充分就业、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安全概念不断被重新定义，深入到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因此，要关注安全理念扩张的原点和过程，评估其与经济政策的一致性，保障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

风险治理与应急管理

典型案例

乡村人才振兴要解答好三个关键问题

□ 张建琴 刘任平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壮大乡村人才队伍”，进一步强调了人才培养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在乡村振兴的现实过程中，人才的缺乏，是当前农村人才困境的典型表现，而这一现象背后反映的，正是乡村振兴中面临的发展困境。显而易见，如果乡村留不住自身发展所需的人才，乡村振兴也就无从谈起。因此，针对乡村人才流失的问题，解答好“进城与留人”“留住哪些人”“怎样留住人”这三个关键问题。

处理好农业从业人员进城与农村留人的关系。乡村人才振兴需要跳出一个认知误区，即有一种意见是农村人口不能继续外流，这种观点未必符合发展规律。事实上，农村人口外流进城务工依然是大趋势，需要把该打开的“城门”打开，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截至2023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但农村依然有4.7亿多常住人口、6亿左右户籍人口。即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5%，农村依然有3亿多常住人口。可见，乡村振兴拥有的农村人口数量并不少，但关键是人才结构的质量而非人口的数量。因此，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必须要处理好农业从业人员进城与农村留人的关系。

一方面，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鼓励能进城愿进城的农民更快更好融入城市，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等合法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其原因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的方向，随着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智能化、信息化发展，客观上不少农业直接从业人员需要退出。

另一方面，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适度规模型的经营人才

需要增加。随着乡村“三产”融合发展，必定会大量需求懂得“农工文旅旅”融合的复合型人才，但这些人人才的需求量要与农村产业的实际发展水平相匹配，以提升乡村振兴中所需要的人才的整体质量。

乡村全面振兴需要留住哪些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主要是高素质现代农民、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者，应该鼓励这些人回到农村。因此，乡村全面振兴需要留住的是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公共卫生体育及科技等各方面人才，而不是简单地说“乡村留人”，更不意味着扭转农村人口减少的大趋势。

一是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农业是乡村的特色主导产业，农业生产经营人才是乡村人才的重要主体。因此，需要留住以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农业企业经营者和高素质农民队伍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经营人才。

二是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才。乡村产业振兴，必须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要效益，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乡村全面振兴需要留住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人才。

三是乡村公共服务人才。乡村环境美不美、教育质量好不好、医疗水平高不高、文化休闲娱乐丰不丰富决定着乡村能否留住人。因此，乡村全面振兴需要留住高质量的乡村规划建设人才、乡村教育人才、乡村卫生健康人才、乡村文化旅游体育人才。

四是乡村治理人才。乡村善治是乡村全面振兴的保障和基础。要实现乡村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统一，就必须吸引留住优质的乡镇党政人才、村级党组

织人才、村级经营管理人才、村级法治人才和村级社会工作人才。

五是农业农村科技人才。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要留住农业农村高科技领军人才、农业农村科技创新人才、农业农村科技推广人才和科技特派员等农业农村科技人才。

通过“规划+产业+机制+环境”组合留住人。乡村要想吸引人才、凝聚人气，必须有产业作支撑。乡村留住人才不仅需要评估人才供求总量和结构，还要以乡村产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为蓄水池吸引人才，更需要通过完善的体制机制和良好的环境留住人才。只有先着力构建起以产引才的体系，才能实现以才促产的工作格局而留住人。

一是制定乡村人才专项规划。一方面，对标乡村全面振兴需要，评估乡村人才供求总量和结构，细分乡村人才供求目录。另一方面，在摸清乡村人才现状基础上，制定乡村人才振兴规划，明确乡村人才振兴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政策措施。

二是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打造吸引留住人才蓄水池。一方面，各级党委政府要完善扶持乡村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复垦腾退建设用地指标支持各类乡村人才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另一方面，持续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鼓励证券、保险、担保、基金等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引导工商资本投资乡村事业，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三是建立健全乡村人才振兴体制机制。首先，完善县级以上机关年轻干部在农村基层培养锻炼机制，有计划多渠

道选派优秀干部到农村干事创业。其次，支持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政府、高等学校、职业院校加强合作，按规定为艰苦地区和基层一线“订单式”培养专业人才。同时，建立城市医生、教师、科技、文化等人才能定期服务乡村制度，支持和鼓励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科研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到乡村和涉农企业创新创业，充分保障其在职称评审、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益。最后，建立县域专业人才统筹使用制度，积极开展统筹使用基层各类编制资源试点，探索赋予乡镇更加灵活的用人自主权，鼓励从上往下跨层级调剂行政事业编制，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倾斜。

四是营造乡村招才引智的良好环境。首先，加强农村工作干部队伍的培养、配备、管理、使用，将干部培养向乡村振兴一线倾斜，注重提拔使用政治过硬、实绩突出的农村工作干部。其次，要搭建乡村引才聚才平台。既要强化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园区、农村创业创新园区等就业平台，还要建立健全乡村人才驿站、人才服务站、专家服务基地、青年之家、妇女之家等人才服务平台。最后，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发展条件，提高农村生活便利化水平，优化农村生活环境，吸引城乡人才留在农村。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之一，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乡村信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充分利用以5G、物联网、大数据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加速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发展特色农业，将进一步带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崭新动能。近年来，许多基层乡村（社区）通过构建各种形式的数字化议事协商方式，实现“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不断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然而，数字化议事协商作为基层乡村（社区）的一项创新探索，实践中依然面临着“协商渠道”“协商信息”“协商规则”“协商流程”“协商机制”等方面的堵点，需要通过乡村（社区）议事协商体制、机制、流程等方面的系统性变革，让“协商”与“数字”叠加，实现“1+1>2”的善治叠加效应。

以“数字协商”跨越物理空间鸿沟，实现议事协商“渠道通”。当前基层乡村（社区）议事协商的第一大堵点缘于议事协商主体各种形式的社会流动。议事协商主体的不在场既影响议事协商的过程，也影响议事协商的效果，而议事协商效果又直接影响到乡村（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议事协商过程中，除了直接利益主体的参与外，乡村（社区）内部不同利益关联方的参与、各种外部力量的参与也非常重要。比如全国各地推行乡村（社区）合并，但调查发现，行政合并容易，经济股份合作社合并却很难，原因在于其涉及的利益相关方众多，无法一蹴而就，必须通过议事协商甚至多轮议事协商才有可能达成。在议事协商过程中，许多利益主体不在场，但又必须参与。此时，数字化协商就能派上用场，因为基层数字化议事协商具有跨越物理空间鸿沟的优势。一方面，数字化议事协商能够让更多因为临时外出、异地就业、举家搬迁、行动不便等原因无法及时参与线下议事协商的居民获得自我意见表达的渠道。另一方面，数字化议事协商也让更多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专业机构人员参与进来，提高了议事协商中的信息透明度、过程公正性与结果的可行性，最终实现乡村（社区）善治。

以“数字协商”跨越信息不对称，实现议事协商“信息通”。当前基层议事协商的第二大堵点，在于人民群众对于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深化，通过议事协商满足群众的需求难度越来越大，经常出现协商议题难以收集、协商主题难以确定、协商议程难以快速启动等问题。数字化议事协商的优势在于能够解决协商议题的快速收集与筛选，快速确定协商主题并快速启动议事协商程序。近年来，全国许多基层乡村（社区）开发了议事协商应用小程序，能够随时随地收集协商议题，并通过议题网上筛选确定协商主题，及时启动线上议事协商程序，取得了很好的实效。可以说，人民群众通过手机应用小程序，随时随地了解协商议题的相关信息，随时随地提出自身需求，随时随地发出相关疑问，既畅通了信息，也将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

以“数字协商”推进规则规范化，实现议事协商“规则通”。议事协商议题确定后，基层乡村（社区）还会受到议事协商规则随意化问题的困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参与协商议事代表的产生不够规范，个别基层乡村（社区）干部为了让投票更漂亮，让支持和同意自己主张的协商代表参与议事协商，这在表面上提高了议事协商的通过率，但却让议事协商失去了公共意见基础。二是在议事协商表决过程中容易出现人情面子因素干扰，影响议事协商结果的客观公正。因此，“数字协商”通过随机抽样方式遴选议事协商代表，确保了代表产生过程的客观公正，从而避免了议事协商出现“一面倒”现象。同时，在协商表决环节，通过设置线上无痕化投票规则，议事协商的投票环节也能有效避免各类人情面子等因素的干扰，从而真正将矛盾和问题消解在萌芽状态，

让「协商」与「数字」叠加 赋能乡村治理

□ 黄鹏进 董敬畏

确保议事协商更加客观公正。

以“数字协商”构建全周期闭环管理，实现议事协商“流程通”。基层议事协商的全周期包含协商议题的筛选与确定、协商会议的策划与组织、协商过程中的多方发言与决议、协商结果的公示、协商结果的落实进展、协商结果落实情况的监督与反馈等环节。实践中，基层乡村（社区）在线下议事协商过程中经常出现时间跨度长、流程不闭环等问题。而“数字协商”通过全周期闭环管理，解决了线下议事协商面临的流程分割问题。一方面，“数字协商”能够对协商事件、处理进程、结果反馈实现全流程监督。另一方面，“数字协商”能够确保基层议事协商的全流程记录留痕，确保数字化议事协商全程公开可查询。具体而言，“数字协商”使得乡村（社区）议事协商信息实现快速流转、协商程序循序展开、协商结果落实情况及时反馈，做到协商前、协商中、协商后全周期闭环管理。同时，“数字协商”也能够将基层乡村（社区）议事协商纳入更高级乡镇（街道）的社会治理信息系统，实现乡村（社区）与乡镇（街道）各类信息的无缝对接。

以“数字协商”促进互联互通，实现议事协商“机制通”。基层乡村（社区）的议事协商作为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一环，既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也是基层群众治理身边事务的途径与渠道。由此出发，基层议事协商既要与其他机制形成合力，也要与其他体系构成整体。实践中，基层乡村（社区）线下议事协商往往与其他机制难以形成合力，也无法与其他体系构成整体，仅限于村社范围内治理议题最大公约数的达成。对此，“数字协商”能够发挥多元互联互通功能，进而实现与其他治理机制的有效衔接和其他治理体系的有机整合。近年来，部分乡村（社区）议事协商通过统一的数字化平台将各类议事协商主题汇总，再经过相关程序梳理出一段时间内基层乡村（社区）民众普遍关注的热点与焦点事项，这既为解决群众普遍关注的急难愁盼问题奠定了调研基础，也为相关部门了解基层问题提供了相应渠道。同时，“数字协商”能够实现与“两代表一委员”常态化走访、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等平台在机制方面充分对接融通，从而更好地将民情民意居民诉求反映给相关部门，在治理层面实现“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双轨对接，真正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